

主编：〔德〕顾彬
译文审校：李雪涛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德〕顾彬 著 范劲 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德」顾彬 译文审校：李雪涛

第七卷 「德」顾彬 著 范劲 等 译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德)顾彬著;范劲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

(中国文学史;7)

ISBN 978-7-5617-5892-2

I. 2… II. ①顾…②范… III. 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IV. I 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729 号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

by Wolfgang Kubin

© 2005 by K. G. Saur Verlag GmbH, Münch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5-283 号

中国文学史(第七卷)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

著 者 顾 彬(Wolfgang Kubin)

译 者 范劲等

责任编辑 储德天

特约编辑 郑英旻

责任校对 薛 靖、袁佩君

封面设计 魏宇刚

版式设计 储 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7.5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892-2/I·418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文版序

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但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评论一位唐代的作家比评论一位2007年的女作家显然要容易得多。此外,相对于一个拥有三千年历史的、高度发达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在五十年间的发展又是怎样?它依然在语言上、精神上以及形式上寻求着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德国也不例外。当今有哪位德国作家敢跟歌德相提并论?又有哪一位眼下的中国作家敢跟苏东坡叫板?我们应当做到公正。在过去鼎盛时期的中国也有几十年是没有(伟大的)文学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期待每一个时代都产生屈原或李白这样的文学家吗?一些文学家的产生是人类的机遇。一个杜甫只可能并且只可以在我们中间驻足一次,他不可能也不会成为大众商品。

1967年我在大学学习神学时,首先通过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译文发现了李白,因此,中国的抒情诗便成了我的最爱。这种最爱不仅仅局限于悠久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早在第一批德国诗人开始创作前的两千年,中国诗人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德国才有诗人可以真正同中国诗人抗衡。

我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三卷(诗歌、戏曲、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我亲自执笔的。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能独自一人完成这么多卷书稿。其间又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个中缘由我在此不便细说。对我来说写作有时并不困难,特别是诗歌史这一卷更是如此。我很庆幸可以在此回忆一下往事。20世纪70年代初我有幸在波鸿鲁尔大学师从霍福民(Alfred Hoffmann,

20世纪中国文学史

1911—1997)教授,他于40年代在北平和南京跟随中国的先生们学习过解诗的方法。胡适也属于他当时的先生和朋友之列!几乎在每节课中霍教授都向我们少数的几个学生讲解分析古典(唐)诗的“三步法”(破、转、结)。霍教授解唐诗的视角使我铭记在心,一直到今天我还在用这些方法。他所拥有的这门艺术似乎在汉学界(在中国也不例外)几近失传,而正是在这一艺术的基础之上,王国维提出了中国抒情诗的两种意境之说,而刘若愚又在此之上扩展为三种境界的理论。

正是借助于这三种境界的理论,我在书中描述了中国思想的发展,因此我的中国诗歌史并非一篇简单的论文,而是对中国思想的深度和历史之探求!我前面提到的其他两部半著作也可作如是观!我所写的每一卷作品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这点我在每一部的前言中都提到了,在此恕不赘言!

德国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1902年以来,德国汉学家一再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位,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之后的来者不再会想写一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了,而只是断代史,以及具有典范作用的有关古代,或中世纪,或近代的文学史。我和我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was),为什么(warum)以及怎么会这样(wie)?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

在放弃了福音神学之后,我接受了古典汉学的训练,也就是说我成为了一位语文学家,尽管我能读现代汉语,但既不能说,也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1974年11月我快30岁的时候,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给我提供了一个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现代汉语的机会。在北京的一年里,我认识了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价值。一年之后,我于1975年到了日本,在那里更加勤奋地阅读了大量译成日文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今天我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来回首往事:1967年我是从李白开始慢慢接触中国文学的,1974年通过现代汉语的学习,我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意外的深度,这两个年份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二者都与语言和文学有关,其核心当然是中国了。这一切不是偶然,而是命运!

顾彬

2008年8月

前言

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像 20 世纪中国文学那样,如此详尽地得到记录,如此一再地被翻译,如此深入地被文学研究者所挖掘,可谈到其文学价值,也没有哪个时代像它那样多地招争议。从 1912 年民国成立开始,中国作为一个正式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了世界共同体和世界历史之中,因为中国从世界帝国(天下)转变成了民族国家(国家)。自此以后她在政治、经济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上都在国际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文学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这一转化的基本见证,不管是说它参与了促成中国的变迁,还是说给出了关于这个变迁的讯息。这一事实到现在导致了一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深入得不成比例的探究:其他所有时代不论是怎样璀璨,都只能远远居于其后。在此期间的西方出版物——不管是翻译还是研究文章——甚至在单行本中,不光那些二流作家触手可及,就是三流作家的代表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反之,那些毫无疑问应归入世界文学之列的古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在西方常常是除了大学毕业论文外就压根无人问津。过往的一切均已逝去,对许多人来说接近中国的丰富传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可想而知,许多因为政治和时代因素主要是在 1979 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后才被译介到西方来的 20 世纪中国作家也终将要或已经迈入被遗忘之途。图书市场和文化产业通常不会对哪个作家保持超过十年以上的记忆。就在现在,最近 25 年里的许多作品就已经只有专业读者知悉了。属于其列的自然也包括高行健(1940 年生)的作品,他仅仅因 200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才得以在短时间内重返公众视野。同中国大陆其他领域一样,权威的失落也波及到了文学研究。有一种自 90 年代时髦起来的做法现在更演变成了普遍行为,即压低那些国内乃至国际上公认的现代中国文学代表作家,同时抬高那些过去看来不太重要或干脆属于通俗文学的人物,从现代中国文学之父鲁迅(1881—1936)到当代武侠小说代表作家金庸(1924 年生)的范式转换在这里具有典型意味。要发

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掘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理所当然地需要距离,这个距离目前还不够充分。而对一个可能的评价问题而言,下一个难题则是常常欠缺对中国以外的现当代文学的了解。譬如谁要是关注德语当代文学的话,就会出乎其意料地发现,它比起华文文学来并不见得好多少,当然也不是糟糕许多。

如果不想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枯燥乏味,如果不想毫无评论地罗列事实,就一定得和评价沾点边。不过,我在以下行文中给出的评价都是个人的主观见解,并不图普遍有效,尤其不奢望经久不灭。每个人都有权利作出不同判断,特别那些被涉及到但没有得到显赫位置的作家,如果他们还在世,并不需要对我的选择程序私底下感到不满,而只需要把这种遴选看成是为了写成一部文学史所必备的前提。我的偏好与拒绝都仅代表我个人,如果它们更像是偏见而非判断的话,肯定也要归咎于中国在20世纪所处的那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今天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汉语区域如新加坡或北美的华人圈,全都有它们的华文文学,人们不可能同时地,在同样程度上和不分时代地去欣赏它们。某些必要的删减也属于文学研究者的批评工具。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在这方面我的榜样始终是鲁迅,他在我眼中是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除了他的重磅作品之外也有其他的零散之作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这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对一个综合评价来说起决定意义的是全部创作的整齐性问题。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论断总是能成立的,即不能根据某个作家的单部成功之作就对其整个创作下结论。就算某个中国作家真能有那样长一个创作期,标准在几十年中也会变得面目全非。

呈现于此处的文学史要追溯到我从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初在波恩大学于不同场合所作的讲演课,听众在多数时候是少之又少。我的努力是,尽量做到不要重复自己,那就是说:所有我迄今为止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写的论文,除了某些受时代局限的评判不算,都继续保持其有效性。我在行文中不能也不该总是提到它们。然而,如果它们还是时不时地被引用到的话,也请尊敬的读者见谅,因为自我引用乃是迫不得已。从1977年到1985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从1985年到1995年在波恩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其间某些翻译和研究已经完成,它们一直还没有失却其有效性。同时,这也和那种状况相关,即1989

年后,许多人将我的研究对象——在 80 年代可是一个热门话题——将我,连同我全然以批判为己任的热情(几乎是)独自地遗留在那里。我本该寄望于其他人的研究之处,就只能如此遗憾地以引述形式取自我本人的出版物。这样我就得在文本中从内容上重复自己,而且没有什么比将自己说过的话再写一遍更让我难受了。

在中国文学明显遭受冷落的不利情形下,这些演讲录的撰写伴随了相应的怀疑甚至绝望,也是事属必然。如果不是同陈思和(上海;1954 年生)、翟永明(成都;1955 年生)、欧阳江河(北京;1956 年生)、王家新(北京;1957 年生)和肖鹰(清华大学;1962 年生)这些作家学者们持续的交谈,我可能永远无法完成写作计划。除了对问题的深入看法之外,我还要感谢他们一贯的鼓励。否则我已经屈服于既在我国国内也在中国唱响的悲观论调,他们均声称,现当代中国根本没有(好的)文学可言。这些谈话常常是在我由设在波恩的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资助在中国的多次客座访问期间进行的。对此谨向该中心致以应有的谢意。

为方便计,我保留了通行的分期法。就像其他文学研究者那样,我把 20 世纪中国文学分成近代(1842—1911)、现代(1912—1949)和当代(1949 年后)文学。当然,这样一个区分背后,是一个主要以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为参照的阐释模式。尽管也有其他种种划分,但它们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普遍的公认。

对我的写作而言,那些迄今为止出版的系统性文学史当然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尽管我对它们经常采取批判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学史书写热潮在质量上并不如数量上那样可观。尽管一个详尽研究是读者所要求的,我却必须防止材料的漫漶无边。在大量文学史书籍中,下列著作应该作为代表被提及,它们对我特别重要:杜博尼(Bonnie S. McDougall)和雷金庆(Kam Louie)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7 年;钱理群(1939 年生)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陈思和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我得益于这些文学史之处,并非全都被一一地指出。

我没有选择将我在这些年中汲取的所有参考文献和所有作品一一引用、列举或加以评论。我宁愿尝试去呈现一条内在一致的上下关联,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 20 世纪思想史。我完全清楚,这样一种上下文关联是人为的。它的产生当然要归之于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顶多是也只能是许多种可能阐释中的一种。我

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有意识地要避开那种将标题和名字任意地照单罗列,由此而制造一本新的参考手册的做法。当然,所有引用到的作品我都阅读和查看过原文。但也不是总能找到最初版本,有时只能满足于重印和新版本,这一情况显然也会带来问题。

尽管有违政治立场的正确,我还是选择中型的“男性”定冠词,而这就一并包括了阴性和中性。所以我讲作家而不是男作家或女作家,否则我可能还被迫要在“他”和“她”的人称代词外再引入“它”,因为儿童也不甘被撇在男人和女人之后。^①

我遵循旧的正字法,同时使用通行的汉语拼音注音系统。其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总是能清楚地解决的。某些不一致之处因此就不可避免。首次发表时间也并不总是能在原稿完成、杂志上首次登载和以书本形式面世之间作出明白区分。所以在年代标注上可能会有所差异。

Nicola Dischert 为原稿付印提供了技术和语言方面的协助,她除了版面设计外还制作了索引,还要感谢 René Weiler、刘导和 Sinda Kapp-Matsukawa 女士帮助处理了某些办公事务。在有关民国时期文学的细节问题上,我得益于鲁尔波鸿大学的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关于港澳台文学,香港科技大学的郑树森(英文名 William Tay)解答了我许多问题。我同时要感谢他这些年中无私地寄给我许多材料。马克·赫尔曼(Marc Hermann)详细校阅了全部原稿,纠正了一些错误。也承蒙陶泽德(Rolf Trauzettel)提出的批评建议,即我作为(文学)史家也要去处理我不喜欢的作家作品,只要他们具有历史意义。我还要对张穗子表达感激之情,自1981年9月以来,她一直陪伴我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出批评意见。很多东西都是她为我阅读、发现和思考的。

我同现代中国文学打交道始于1974年10月,那是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我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生赴华一年,学习现代标准汉语。授课中经常有些最近的文学作品作为示例,于是我知道了鲁迅和浩然。时过境迁,这期间发生了种种变化,当年的教师也不大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了。对他们和我而言始终如一的,只

^① 这里的说法跟德语名称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的语法特点相关。言下之意,如果像现在流行的处处顾忌男女平等,又会形成新的僵化,如同作者戏谑的说法:是不是也要照顾到儿童(人称为“它”)的语言地位呢?这一“闲笔”实是顾彬针对美国汉学界中过度强调的女权主义观点而发,顾彬曾讲过,他所属的波恩学派一致认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区分第三人称的‘他’和‘她’是不科学的”(见顾彬《略谈波恩学派》,《读书》2006年12月,119页)。——译者注

是多年来彼此的互相关怀。这段时间是否过得有意义,就请尊敬的读者在接下去的阅读中自行判断了。

原稿经过许多人多次校阅,可能仍然存在的错误应全部由作者负责。

顾 彬

波恩,2005 年圣灵降临节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

- 一 导论:语言和国家形成 3
- 二 从传统到现代:世纪之交的文学 10

第二章 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

-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1915—1927) 21
 - (一)“五四”运动(1915—1925) 22
 - (二)救赎的文学:鲁迅(1881—1936)和《呐喊》 30
 - (三)自我救赎的文学:郭沫若(1892—1978)和《女神》 42
 - (四)文学和自怜的激情:郁达夫(1896—1945) 51
 - (五)新文学:先驱者和体裁,组织和形式 62
-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1928—1937) 101
 - (一)小说家 105
 - (二)海派作家 148
 - (三)现代主义诗歌 153
 - (四)散文 162
 - (五)戏剧 172
- 三 文学的激进化(1937—1949) 178
 - (一)战争,城市和后方 179
 - (二)延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学实践 185
 - (三)文人文学 201

第三章 1949 年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

- 引言 233
- 一 从边缘看中国文学:台湾、香港和澳门 235
- 二 从中心看中国文学 252
- 三 文学的组织形式 257
-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261

(一) 文学的军事化 263

(二) 人道主义的文学(1979—1989) 305

五 展望:20 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商业化 345

参考文献目录 370

译后记 420

20世纪中国文学史

第一章

现代前夜的
中国文学

一 导论：语言和国家形成

民族国家的产生同语言形成有一定关系。因此，语言规划不仅对于许多年轻的民族，而且对一些出自于一种宇宙性(universal)状态^①且演变成某种独特物的(世界性)帝国而言，都是身份规定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特别适用于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期的中国。作为“天下”(普天之下的一切)，中央帝国一度就是寰宇，所有居于其边缘者都要向它纳贡。于是它的文字就是所有人的文字，它的文献就是世界的文献。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从前并不属于世界文学，因为它作为天下的文学自身就是世界文学。只有当帝国的这种自我意识遭到了彻底质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经典开始被重估时，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从中国传统向西方现代性过渡的决定性阶段随着国门被强行打开而开始。大不列颠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导入了一种演变，接下来越来越多地迫使满清政府将沿海地区和交通路线向国际性商贸开放。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占领，然而中国并没有成为殖民地，甚至半殖民地这个术语如果考虑到国土的幅员辽阔也是可疑而非可信的。然而逼人的形势导致皇室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开始采取应对措施。1861年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开始同那种“天下”意识形态告别，以及逐渐地向另一种观念过渡，即必须且愿意像其他国家一样也成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成员。^②

① “宇宙性”形容传统中国思想和文化所追求的那种与天地交融的“天人合一”存在状态，落实到政治社会层面，就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政教、家国不分的状况。“Universismus”(宇宙主义)是西方汉学用来描述中国的一个经典概念，如高延(J. J. M. de Groot, 1854—1921)的名著《宇宙主义——中国的宗教和伦理、国家和科学之基础》(Universismus. Die Grundlage der Religion und Ethik, 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en Chinas, 1918)。顾彬在本书中所暗示的，即从宇宙主义到辩证斗争，从笼统的“天下”到个体性的民族国家是迈入现代的标志，正是西方汉学界的主流看法。——译者注

② 这里和以下见耿德华(Edward M. Gunn, jr.):《重写中文：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风格和革新》(Rewriting Chinese. 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P)1991年；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

总论 中国文学史

还在1911年帝国倒台和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传统的儒家典籍就走到了尽头。新的知识通过居留于当地的外交使节和军事人员、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同耶稣会士在17和18世纪的沟通尝试不同,这一次的知识传输并非同朝廷中眼光敏锐的精英相联系。而是所有阶层——即使不是所有的个人——不管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都同样被卷入进去。因为新知识很少以原文形式,而是通过对西方著作的翻译被介绍过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①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从本质上因翻译而生的现代。翻译的艺术不仅对中国精神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作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标准国语的形成。许多概念、指称和观念本来并没有真正的对应物,而是经由日本中转进入了汉语中。这个岛国更加迅速而彻底地仿照西方模式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从而在1895年割占了台湾,1905年又赢得了对俄战争。东京在世纪之交时即已成为中国革命的青年的秘密首都。这里和别处一样,人们开始使西方科学适应于日语,而且尝试利用中国字符和借用来的汉字双音词。那些新鲜的表达法看上去常常就像是先前的中国术语再生和一次向中国的重新回输,而其实际意义已大相径庭。如此这般地,陌生者就以表面上的本土形态发挥其效能。特别对于句式和语法规则更是如此。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科学的翻译都不应当、也不再能仅针对老派的精英层,而开始越来越多地舶来异域的语言资产并改变业已经典化了的文言。另外就是对于白话的缓慢承认,这种白话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东北部的口头语言越来越书面化了。^②

言文分离曾是帝制中国的一个标志。人们并不照所说的那样去写,也不照所写的那样去说。^③然而这种规则其实还在语言改革之前很久就遭到了破坏。这里有两个演化特别重要:戏剧和小说文化的形成,它们很少遵照文言文而开始适应于当代的语言情境,还有就是一种通常被西方人称为“Mandarin”的官话的使用,官员们为

① 德文的 *Moderne*, 顾彬在这里的使用方式有“现代”、“现代性”、“现代派”等多种,中心意思是一种同中国的儒家传统相对立的以进步、科学和怀疑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但从顾彬的用法来看,其中也包含了西方的现代主义那种碎片、非中心、虚无的倾向(这其实已接近了后现代某些主张),是十分宽泛的概念。所以在本书的使用中,我们必须警惕,不要和专门的流派“现代主义”(如后面讲到的戴望舒那种“现代主义”)混淆起来,这种现代主义流派和思潮只是较广义的顾彬意义上的“*Moderne*”的一部分或一种表现。——译者注

② 关于这个复杂话题,特别请参见司马涛(Thomas Zimmer):《白话:中文口语书面化问题——基于敦煌“变文”的形态特征做的描述》(*Baihua. Zum Problem der Verschriftung gesprochener Sprache im Chinesischen. Dargestellt anhand morphologischer Merkmale in den “bianwen” aus Dunhuang*),奈塔尔:斯泰纳出版社(Nettal: Steyler)1999年。

③ 试比较 Erhard Rosner:《书面语:现代中文中的言文并列现象研究》(*Schriftsprache. Studien zur Diglossie des modernen Chinesisch*),波鸿:布洛克迈耶尔出版社(Bochum: Brockmeyer)1992年。

为了更好地实现交流,把它从北京地区携带到了外省。^① 书面语和交流语言相互调协而生出的一个自然的、然而也是典型的结果,就是一种混合了两类不同风格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在文学中可以碰到。小说《红楼梦》(1792)在这方面可被视为代表。^② 人们应该认识到,由一种混合语言形式取代文言分离已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它在唐代(618—907)就已开始,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仅仅是那些很少被书面化,也许根本无法书面化的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或上海话的存在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语言从来就没有像北方中国话那样得到官方支持。然而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也可以分辨出不同的若干阶段来。清代(1644—1911)末年的语言实践被民国的改革者提升为规范。白话教育是一种新民教育,要为新国家形态的统一服务。但我们不能把这种教育想象成多么有系统性。白话在语言发展上毋宁说是一种半成品。它在其间(1926)被国语,在今天又被普通话、被标准汉语所取代。这同1949年后才在大陆开始推行的,直到最近才在台湾、香港以及澳门显出影响的语言规划有关。^③ 然而1949年这一休止符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改革成了应用于世界范围的,规范今天中国人共同语言的标准,而这也重要的注音系统“汉语拼音”一并包括在内。尽管继续有不同的中文语言和注音形式被日常使用,然而它们绝不能指望获得约束力甚至普遍效力。

自然,中国之迈入世界历史、世界市场、语言共同体和世界文学并非是在过去100余年间骤然发生的。这里不言而喻地已经有了一个很长的预备阶段,大体上最迟可以算作从1517年葡萄牙人抵达南中国海开始。即使在“新时代”(Neuzeit)^④伊始、从南宋(1127—1279)以来,中国就总是做出闭关锁国尝试,然而同西方的零散接触总有发生,留下的痕迹也比迄今所设想和证明了的要丰富得多。要把中国新近的发展从遥远的过去推导出来的想法,因此并非全然不合情理,可是像那种在美国倍

① 普通话,即所谓北京方言,在最近一千年中的形成史过于复杂,这里不能详述;在此参见林焘:《北京话是如何形成的?》(“Wie entstand das Beijinger Mandarin?”),由 Elke Spielsmanns-Rome 和 Huang Humin 译自中文,载于《东方/方向》(Orientierungen)1/1990,53—79页。

② 这里试比较司马涛的文章《白话的一个早期先驱?在经典传统和民间现代性之间》(“Ein früher Vorläufer der Baihua? Zwischen klassischer Tradition und volkstümlicher Moderne”),收入顾彬编:《红楼梦研究》(Hongloumeng. Studien zum “Traum der roten Kammer”),伯尔尼:彼得·朗出版社(Bern: Peter Lang)1999年,109—129页。

③ 这里试比较马汉茂(Helmut Martin):《中国语言方案》(Chinesische Sprachplanung),波鸿:布洛克迈耶尔出版社1982年。

④ 为了和我们的习惯概念区别,我把这个词——本可以译成“近代”——翻作“新时代”。西方汉学在传统上把宋以后看作“近代”的开始,先秦是上古时代,秦到唐宋是中古时代,这自然是对西方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划分法的挪用。——译者注